



李刚 主编

岳阳楼文化

SHIDAI SANWEN
CONGSHU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丛书·
编



李刚

主编

岳阳楼文化

SHIDAI SANWEN
CONGSHU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岳阳楼文化 / 李刚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3

(时代散文丛书 / 李刚主编)

ISBN 978-7-5034-4818-8

I. ①岳…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0541 号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设计制作: 成都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86965202

印刷装订: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610000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1 字数: 52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15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让文学素养成为主流时尚	张一一	1
背《岳阳楼记》：文化之旅的通行证	刘 健	3
《岳阳楼记》的政治文化内涵	李存山	5
岳阳楼大修落成时的宣传文化工作	赵石麟	17
毛泽东与岳阳楼的史事考辩	何林福	25
日月千里寄忧乐		
——千古雄文《岳阳楼记》诞生地探秘	黄军建	34
岳阳楼两篇雄文的注评	何培金	39
范仲淹为何写《岳阳楼记》	陈湘源	51
清高磅礴殷本崇	刘衍清	64
我带着情感与敬意研究岳阳		
——何林福访谈录	李芳梅	69
音乐专辑《天下岳阳楼》全球首发	邹当荣	76
岳阳艺人纸剪中华名楼	禹 露	78
岳阳楼上对君山	李元洛	81
历史名城的深度文化解读		
——序段华《大美楼岛湖》	余三定	87
阅读岳阳楼	何 强	92

岳阳楼随想·····	梅 实	96
岳旭楼的高度·····	易石秋	98
唐诗素描·····	曾 冬	102
吴獬对联艺术特色赏析·····	李东雄	106
天下洞庭天下楼·····	柳忠秧	114
渔歌互答·····		120

让文学素养成为主流时尚

张一一

湖南岳阳楼景区于蛇年大年初一推出的“背《岳阳楼记》，领免费门票”新春活动受到游客热捧，活动举行的十天时间里，有近万人“背”得岳阳楼免费门票，岳阳楼景区工作人员透露，不少游客是为了在亲友面前证明自己的文学素养，而不仅仅是为了一张免费门票。

“市场经济”扭曲了当下不少国人的价值观，当年幼有知的小学生互相攀比谁的爸妈官大、钱多、车好，当统一了校服的中学生互晒名牌运动鞋和手机，当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不惜代价把自己的生日过得“有面子”，当作家、诗人和文学被嘲弄和歧视，甚至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都被取笑“在北京买不起大房子”，酒吧、KTV、洗脚城“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而书店却“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对比鲜明。看到岳阳楼景区外排着长龙，只为证明自己“文学素养”，我的感动不打一处来。

我曾一度对鄙视读书却把“开名车、住豪宅，吃海鲜、喝茅台，泡美女、穿品牌”作为人生最高理想的圈子失去信心，深恶痛绝而又无能为力，可岳阳楼景区争先恐后、跃跃欲试的游客们让我不再那么难过和孤单——这么多年来，我朝思

暮想让文学素养取代相貌、衣服、挎包，成为一张名片、一个标准、一种时尚。

“文学素养”并非没有市场，是时候就会派上用场。几年前陪客的一饭局上，名人明星、政府要员、亿万富豪等各界“成功人士”和“社会精英”高朋满座，某两位刘姓大腕因“《百家姓》里没有刘姓”愤愤不平，一桌人对《百家姓》也大肆声讨，我只好解释一番：刘姓在古代早已是大姓，素有“张王李赵遍地刘”和“刘天下，李半边”之说，古代《百家姓》中不是没有刘姓，而是因为刘姓排到了第252位，“祖武符刘，景詹束龙”，究其原因，是因为《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年，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北汉的君主姓刘，作为赵宋王朝的“敌国”，刘姓自然只能一直往后排到不起眼的位置……那一席饭间，原本不甚起眼的我受到大家的称赞——从那一刻开始，我真切体会到什么名、利、权、色，在文化面前统统渺小不足道，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总会有机会脱颖而出。这，便是文化独特的魅力所在。

在中西文化传播不对等的形势下，若国人互相比较的是彼此的文学素养，而不是耐克和阿迪达斯、爱马仕和路易威登、宝马和玛莎拉蒂……以背不出《岳阳楼记》等千古名篇为耻，以文学素养为社会的主流时尚，那么，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为期不远。

（发表于《北京晨报》2013年2月24日，北京卫视《北京您早》栏目2月25日全文朗诵播出，获北京市年度副刊奖）

背《岳阳楼记》：文化之旅的通行证

刘 健

国庆期间，游客只要在10分钟内用普通话背诵出《岳阳楼记》，就能获得一张“免费通行证”，当天免费畅游岳阳楼。国庆期间，近三千游客通过背诵《岳阳楼记》，拿到了“免费通行证”。（10月8日 新华网）

话说国庆小长假，“黄金粥”里金难觅。扎堆的游客再次饱受了交通拥堵、景点爆棚、导游宰客以及素质败笔之“囧”，却错过了揽古风、登名楼、点文脉又得实惠的“小清新”和“文艺范”。

反观“免费畅游岳阳楼”，背诵名篇可获门票一枚，此举无疑开创了旅游“新规则”的先河，更一举打破了旅游“钱规则”的思维和惯例。不仅是馈赠游客的大礼包，亦是给文化颁发的通行证，料其火爆定不亚于人满为患的其他景区。

与其说是旅游魅力，不如说是文化给力。作为一种文化生活，旅游的内涵本寓于文化。没有文化的灵魂，旅游不过拍照合影、吃喝玩乐之余便又另找下家的游戏罢了。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抒发了先忧后乐、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因此吸引了无数海内外游客前往圣地，一边观赏景色，一边

怀古追思。如今，这种热度不减，无疑是对古人那种坦荡胸怀和爱国理想的礼赞。亦或许，这种文化式旅游更适合作答什么是爱国？

与其说是炒作旅游，不如说是激活文化。明眼人都知道，“免费畅游岳阳楼”绝对又是一次精心策划。然而，如此洋溢着文化韵味儿的“噱头炒作”却尤为得体。揽胜怀古，品味文化，无疑是一次文化之旅和精神加餐。与那些打着文化旗号却来者不拒的景区相比，显然少了铜臭味道，多了文墨气息，更酿出一缕优雅，一丝品味。而它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实惠，更能激发国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别说景区送出 3000 张门票是“大放血”，我看这买卖做的一点也不亏。

言归正传，文化旅游要有吸引力，还需保护与开发并举，服务与策划并重，传承与创新并行。惟其如此，这免费颁发给文化的通行证才能引来旅游文化产业的活水，亦如流连忘返的游客人流，源源不断。

《岳阳楼记》的政治文化内涵

李存山

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在知邓州（今属河南）任上，应老友滕宗谅之约，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文中无论对“岳阳楼之大观”的描写，还是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抒怀，都足以使此文彪炳文学史册，激励百世人心。如果注意到，此文以“庆历四年”为起始，以“时（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为结句，而此期间正是范仲淹从其一生事业的顶峰跌落到晚年的遭谤毁、受贬谪之时，那么，此文所内涵的政治文化意义就更为重要了。

—

范仲淹在文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里的“忧其民”、“忧其君”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和政治抱负，而“进”与“退”则凝练地概括了他一生宦海沉浮的四“进”四“退”。

范仲淹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生于徐州，两岁丧父，母贫无所依，改嫁长山（今山东长山县）朱氏。他21岁时寄居在寺院刻苦读书，23岁询知身世来历，感愤自立，佩琴剑径

趋南都（今河南商丘），“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如此苦学五年乃“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仲淹登进士第，作诗云：“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乡人莫相羨，教子读诗书。”

欧阳修在《范文正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朱熹也曾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范仲淹先后在广德、集庆（今安徽广德、亳县）和兴化（今江苏兴化）等地任职，为民兴利除害，政绩斐然。最显著者是他任兴化县令时，发动通、泰、楚、海四州（今江苏南通、泰州、淮安、连云港一带）民夫，建成数百里的捍海堤，民至今享其利，称“范公堤”。

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写了《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及革赏延之弊”等改革措施。此后，他又写了《上执政书》、《上时相议制举书》等等。在写《上执政书》时，他正居母丧，但“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希望“四海生灵长见太平”。他在书中指出，当时的宋朝已处于“泰极者否”的形势，只有“变”才能“通”而“久”。他所说的“变”就是要“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其中“固邦本者，存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范仲淹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民惟邦本”思想，他所主张的改

革是把“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亦即吏治的澄清作为首要。他深切地认识到：

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

吏治的腐败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故改革应从整饬吏治开始。范仲淹又认识到，“举择令长，久则乏人”，因此，吏治之源还在于“慎选举，敦教育”。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范仲淹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他所谓“慎选举”，就是要改变科举考试以诗赋、墨义（记诵经书章句）来取士，而代之以重视经书之“大旨”（“理道”）和时局之“策论”。他所谓“敦教育”，就是要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学，“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中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

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被授以秘阁校理，这是他进入中央权力机构的第一“进”。当时皇太后垂帘听政，而宋仁宗已18岁。次年，宋仁宗为皇太后祝寿，拟率百官朝拜于天安殿。范仲淹上疏云：“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疏入，不报。他又奏“请皇太后还政”，亦不报，遂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通

判。这是范仲淹由“庙堂”到“江湖”的第一“退”。

明道二年（1033），章献太后崩，宋仁宗始亲政。范仲淹被召赴阙，除右司谏，此为他的第二“进”。太后有遗诰，以杨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国事。范仲淹亟上疏言：“太后，母号也，未闻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宋仁宗准其言，免去对杨太妃的“册命”。是年，范仲淹出使江淮一带赈灾，“使还，会郭皇后废，（公）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不能得，贬知睦州，又徙苏州”这是他的第二“退”。

景佑二年（1035），范仲淹在苏州奏请市郡学，聘胡瑗为教授。是年冬十月，范仲淹被授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判同子监，旋又授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此为他的第三“进”。次年，范仲淹与仁宗论迁都事，略谓洛阳险固，官以将有朝陵为名，渐营储备，“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仁宗将迁都事与丞相吕夷简议，吕称范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闻之又上四论，即《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大抵讥指时政；又献《百官图》，评论朝臣升迁的“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批评丞相用人不公。吕夷简大怒，斥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遂被罢落，出知饶州（今江西鄱阳），这是他的第三“退”。《范文正公年谱》载：“自公贬而朋党之论起，朝士牵连，出语及公者，皆指为党人。”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与韩琦经略陕甘，抵御西夏，“军中为之语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闯之心胆寒；军中有范，

西贼闻之惊破胆。”’谏官欧阳修等上疏，言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仁宗从其请，授范仲淹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由此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这也是他最后的第四“进”。当时，范仲淹“每进见，（仁宗）必以太平责之”。后仁宗“赐手诏。趣使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见赐坐，授以纸笔，使疏于前”。于是，范仲淹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这“十事”中的许多内容见诸当时朝廷的政令，史称“庆历新政”即是指此。这“十事”是：一曰“明黜陟”，即严明对文武百官的“磨勘”（考核），根据其政绩实效来决定其升迁或黜贬；二曰“抑侥幸”，即严格限制把官职“赏延”给人臣子弟，“革滞赏，省冗官”；三曰“精贡举”，即把其“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付诸实施，宋代改革科举，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学，并在京师建立太学，推广胡瑗的“苏、湖之法”，自庆历新政始；四曰“择官长”，即前述所谓“举县令，择郡守”，具体措施是由县级以上层层荐举，按“举主”的多少体安排任用的次序；五曰“均公田”，即授予郡县官吏以“职田”，“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六曰“厚农桑”，即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七曰“修武备”，即参照唐代的府兵制，招募强壮之人，使“三时务农，一时教战”，“强兵节财，抵抗外侮”；八曰“减徭役”，即精简县邑等地方建置，裁撤其官吏，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九曰“覃恩信”，即在皇帝大赦天下时要切实使其“恩信”泽及下民，不能虚以应事，致使大赦以后“钱谷司存，督责如旧，桎梏老幼，籍没家产，至丁宽赋敛、

减徭役、存恤孤贫、振举滞淹之事未尝施行”；十曰“重命令”，即严明法令，凡违制枉法者，治以重罪。

以上“十事”，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可谓针对时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举。但庆历新政施行仅及一年，便因触犯权贵阶层的利益，“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小叫解”。党论兴则迫害起，国子监直讲石介因作《庆历圣德诗》，称颂范仲淹、富弼等人，而得罪枢密使夏竦，此时遭报复，被砸陷致死。范仲淹与富弼等“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会边陲有警，于是以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请罢政事”，“其在中书所施为，亦稍稍沮罢”。随着范仲淹的第四“退”，庆历新政便夭折了。

庆历五年，范仲淹知邠州（今陕西邠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年末，因朝中有人诬陷范仲淹、富弼助石介谋乱，遂罢范、富安抚使之职。范仲淹引疾求解边任，迁知邓州。次年九月，他写成《岳阳楼记》。可见，此文写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最低落、最暗淡之时。文中“进亦忧，退亦忧”云云，《范文正公年谱》谓此乃范仲淹“平日允蹈之言也”，然而，这里又包含着范仲淹多少人生际遇的感慨，宦海沉浮的回顾，以及新政失败以后的深沉忧患！

二

富弼在为范仲淹作的《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中说：范仲淹“历补外职，以严明驭吏，使不得欺，于是民皆受其赐。

立朝益务劲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忻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则然，苟尚未遂弃，假百用百黜，亦不悔。’范仲淹之所以有“百用百黜，亦不悔”的思想境界，是因为他心中有个“道”，这个“道”就是《岳阳楼记》中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仕途的升迁与黜贬始终“忧其民”、“忧其君”，而“忧其君”最根本的也是忧君主不能选贤任能，施行善政，以润泽斯民。同历史上的许多儒家一样，民本主义是范仲淹最根本的价值观。

范仲淹有首流传较广的诗，即《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这也是他“忧其民”的襟怀袒露，其文字虽然质朴，但诗境不亚于毛泽东的“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更足以表达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及其改革志向的是他的《四民诗》。在此诗中，他对农（“制度非唐虞，赋敛由呼吸。伤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几垄，游堕如云集。一蚕吐几丝，岁绮如山人”）、工（“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商（“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在当时所受的压迫、所处的窘境，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他所希望的是进行改革：“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范仲淹本人所处的阶层是四民中的“士”，他说：“前主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螭与妍。”这就是说，君主应该像夏商周三代的“前王”那样，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准衡，授予士之爵禄，与君主“共理天下”。但是秦汉以后，“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

惑”，由此造成了士风与吏治的败坏：“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这种境况给儒学带来的危害是：“裨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在此“裨灶”（喻指佛老）激扬、儒门淡薄的情况下，范仲淹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呼声：“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愿言造物者，到此天地力。”

在范仲淹的思想中，民本、士风、吏治与复兴儒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要使“琴瑟更张”，百姓歌咏“良辰”，就必须端正士风，整饬吏治；而要整饬吏治，“举县令，择郡守”，又必须“慎选举，敦教育”，改革科举考试的取士标准，不是以诗赋、墨义为科考的主要内容，而是据经旨、策论来选拔真正的人才，并且在地方普遍必办学校，向诸生授以“明体达用之学”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已经不是“学者忽其本”的“泛滥词章”，也不是“功名思苟得”的进士场屋之学，而是能够认明儒家之经旨的“经济”（经世济民）之学；它所培养出来的士，虽然须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达身富贵，而是为了把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这种儒家之士即孔门弟子曾参所谓“仁以为己任”者，他们把个人的祸福得失、富贵贫贱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仕途的进退沉浮不能改变其志向，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将此作为自身的终极关怀、内在价值。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终极关怀、内在价值，所以范仲淹“进亦忧，退亦忧”，“假百用百黜，亦不悔”。

宋代的“新儒学”之新，最核心的问题是它为当时的士阶层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佛道二教和功名利禄之徒的新的价值